



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
圖書館

枞阳商周青铜器

安徽大学历史系
枞阳县文物管理所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承创新 繁荣学术

枞阳商周青铜器

安徽大学历史系
枞阳县文物管理所 编
张爰冰 王乐群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枞阳商周青铜器/安徽大学历史系,枞阳县文物管理所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01
(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丛书)

ISBN 978-7-5664-0906-5

I. ①枞… II. ①安… ②枞…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枞阳县—商周时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6135 号

枞阳商周青铜器

安徽大学历史系 编
枞阳县文物管理所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昶颀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210mm×285mm
印 张: 22
字 数: 51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ISBN 978-7-5664-0906-5

策划编辑: 鲍家全 张 锐
责任编辑: 张 锐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西周春秋时期的江淮地区有一群偃姓小国，史称“群舒”。“群舒”是淮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群舒”是淮系族群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群舒”生存于徐国、楚国和吴国等强邻环伺的狭小空间中，“群舒”诸国既有为国家的存亡而无奈地朝吴暮楚，亦有为民族的尊严而悲壮地慷慨赴死。“群舒”在江淮大地上艰难地延续着自身的文化之道，“群舒”在江淮大地上顽强地传承着自身的文化之脉。

在诸多的“群舒”文化遗存中，尤以青铜器所反映的“群舒”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最。安徽大学历史系与枞阳县文物管理所合编的《枞阳商周青铜器》一书，是难得一见的有关“群舒”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的个案研究。

枞阳位于江淮西部、长江北岸，西与桐城、安庆毗邻，北与无为、庐江接壤，东南与铜陵、贵池隔江相望。

西周春秋时期，枞阳地处“群舒”的腹地。枞阳的青铜文化遗址、矿冶遗址、墓葬和青铜器等，构成了枞阳青铜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枞阳从而成为研究群舒文化的代表性地区之一。

《枞阳商周青铜器》以青铜器为纲，采用精美图录的形式全面展现了“群舒”青铜器的风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系统发微了“群舒”的青铜文化。

《枞阳商周青铜器》分为三大部分：

一、文物图录。计选枞阳出土的青铜器 39 件，其中西周青铜器 8 件，春秋青铜器 20 件，战国青铜器 11 件。图版主要采用青铜器的正视图，根据不同器物的特征采用了侧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局部图和青铜器纹饰图，随图附有精美的拓片和线图。图版的设计、编纂和排版更是别具匠心，不仅突破了常规的文物图录的窠臼，而且满足了文物爱好者、艺术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不同需求。

二、专题研究。大致分为四个专题：一是文化综论，《长江下游枞庐地区青铜文化初论》对枞阳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论，《商周考古综述》对枞阳地区的商周考古进行简明扼要的综述，两篇皆堪称枞阳青铜文化的点睛之作；二是青铜器研究，包括枞阳出土青铜容器、兵器、工具和青铜器纹饰的专题研究；三是青铜工艺研究，包括枞阳出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化学成分、金相组织、铸造工艺等专题研究；四是青铜文化综合研究，包括枞阳矿冶遗

址调查、冶炼遗物、淮式鬲、原始瓷以及枞阳的历史地名、历史文化等专题研究，其研究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全、研究程度之深，为一般的文物图录所不能比拟或比肩。

三、文献目录。文献包括了专著、图录、地方志、考古发掘报告、调查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空间涵盖了安徽的江淮地区，时间涵盖了夏商周时期，内容涵盖了考古学文化、遗址、墓葬和青铜器研究等。

由于历史文献对“群舒”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阙而勿据，因此多年来有关“群舒”的研究始终不见有新的进展，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研究的朝野喧嚣相比，群舒文化的研究可谓波澜不惊。《枞阳商周青铜器》的出版，毕竟吹皱了一池春水，毕竟为群舒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诗肠鼓吹的契机。尽管《枞阳商周青铜器》的出版对于群舒文化的研究仍属管中窥豹，但有了这样一个时空坐标，对于群舒文化既可“瞻前顾后”，又可“左顾右盼”，以枞阳的青铜文化和商周青铜器作为群舒文化的内核，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外延，为进一步全面探讨群舒文化的文化内涵、文化性质、文化源流以及与周、徐、楚、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系文化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淮系族群在华夏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

“群舒”的历史可上溯到虞夏时期的皋陶。

皋陶，少昊之后，偃姓，曾事舜。《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论语·颜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史记·五帝本纪》：“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皇甫谧《帝王世纪》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赐姓曰偃”。据此，皋陶当为东夷之人，偃姓的群舒诸国皆为皋陶之后，英、六可能是群舒中最早的封国。

皋陶或为涂山氏之首领。《尚书·皋陶谟》：“（禹曰）：‘予娶涂山……’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如是，则皋陶与夏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即涂山氏与夏后氏为姻亲关系的部族联盟。

夏商之际，涂山氏或为南巢。《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涂山在寿春东北，涂山，国名。”《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国语·鲁语》：“桀奔南巢。”韦昭注：“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是也。”如涂山为南巢，则与禹、桀关系密切，其部族联盟的关系贯穿夏王朝的始终。

西周时期的“群舒”虽偶见于文献记载，然淮夷和南淮夷却屡见诸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尚书·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史记·周本纪》：“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既絀殷命，袭淮夷……”《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胙，作胙誓。”见铭文的有录或卣：“淮夷伐内国。”或方鼎：“率虎臣御淮戎。”競卣：“命伐淮夷。”无彘簋：“王征南夷。”敌簋：“南淮夷迁及内伐□□。”虢仲盃：“伐南淮夷。”师寰簋：“征南夷。”等等。



淮夷与南淮夷当为生活在淮水两岸之人，淮夷、南淮夷与群舒生存于同一地理空间，淮夷、南淮夷当为周人对生活在淮水两岸之民族的他称或蔑称，因此西周时期的“群舒”或被周人泛称为“淮夷”“南夷”“南淮夷”。

《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预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孔颖达疏：群舒，“《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

“群舒”的历史主要见于春秋。“群舒”有舒、舒鸠、舒庸、舒龚、舒龙、舒蓼、舒鲍、英、六、蓼、宗、桐、巢等国，群舒又称“众舒”。《左传》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

“群舒”可能是从徐分出来的一些小国，《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可证徐、舒已不是一指。《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子·人间训》：“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二（六）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群舒”也可能属陆地而朝徐偃王的三十六国。

《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预注：“舒国，即庐江舒县是也。”《史记·楚世家》：“（楚庄王）十三年，灭舒。”

《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

《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杜预注：“宗巢二国，群舒之属。”

《左传》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左传》：“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史记·吴太伯世家》：“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六年……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而伐舒蓼……不克而还。”《春秋》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左传》：“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舒蓼以弱小之国敢于与强楚抗争，使楚“不克而还”。

《春秋》成公十七年：“楚人灭舒庸。”《左传》：“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左传》：“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春秋》定公二年：“秋，楚人伐吴。”《左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秋，



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群舒皆亡于春秋，除巢之外，基本上都被楚国所灭。

枞阳为宗国，公元前615年（鲁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楚将子孔执舒、宗两国国君，宗国遂亡。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枞阳青铜文化和青铜器的研究，应将其置于“群舒”的文化背景之下和置于吴楚的时代背景之下，研究枞阳青铜文化和青铜器所反映的“群舒”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史籍中有关“群舒”记载的阙如或语焉不详，因此考古学资料和考古学研究弥补了历史文献的缺陷。《枞阳商周青铜器》正是这样一部类似百科全书的考古学研究和考古资料的汇编。

爱冰先生是我的师弟，在恢复高考的春雷激荡的日子里，我们意气风发地先后步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是同年入学，又同在考古专业，许多课程都合上，因此爱冰先生也是我的同窗。在寂静的教室和恬静的图书馆里，我们共同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回首往事，真真是“高崖落绛叶，恍如人世秋”。

白驹过隙，马齿徒增，在不知不觉中，我早已过了耳顺之年，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如今清茶一壶，浊酒一杯，于考古学也就“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了。

然爱冰先生却一如既往、百折不挠地追求人生的真谛与学术的永恒，并先后发表了《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铜器研究》《也谈曲柄盃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一批颇有建树的研究论文，对群舒文化和青铜器都有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而我于群舒文化则是门外之人，虽偶有窥视、略知皮毛，却始终未作过一点肤浅的研究。

今爱冰先生嘱我为序。我既是师兄，又兼同窗之谊，既承抬爱，岂能掠其期待？因此不揣浅陋，血指汗颜地写上几句不伦不类的文字，目的是重申“二重证据法”。

在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二重证据法”在夏商周考古和青铜文化的研究中是无法超越的理论，是不可替代的方法。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二重证据法”愈来愈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我真诚地希望爱冰先生与合作者乐群先生及其弟子在群舒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在群舒文化和桐城学派的浸润下致力于文献研究的振兴，振笔为文，代有传人，以枞阳青铜文化和青铜器的研究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将群舒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

是为序。

张 敏

2015年4月2日初稿于芜湖

2015年4月12日改定于南京

- 一、本书由图版和专题研究两部分构成。
- 二、图版收录安徽枞阳县境内出土、且收藏于枞阳县文物管理所的商周一战国青铜器 39 件，均为首次整理发表。
- 三、每件器物均将照片、线图、拓片同时发表，方便读者使用。
- 四、图版按器物的出土单位集中排列，同一单位所出器物依年代先后为序。
- 五、器物说明内容依次为：图版编排的顺序号、器名、藏品编号、年代、出土时间及地点、收藏单位、器物尺度、器物重量、器物描述。
- 六、器物尺度以厘米计，器物重量以克计。
- 七、专题研究为分专题、多学科综合研究，内容涉及器形、纹饰、铸造工艺、矿料来源、矿冶遗址、冶炼遗物、考古学文化、文献考订等。
- 八、全书最后附有引用文献目录，目录编排以文献作者拼音为序。

前言·长江下游枞庐地区青铜文化初论

Introduc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ronze Culture of Zongyang -Lujiang Area in Lower Yangtze River

在今江西南部、长江北岸的安徽枞庐（枞阳—庐江）地区，包括今枞阳县大部、庐江县南部和无为县西南部，自商代晚期到西周、春秋时期，存在着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枞庐青铜文化遗产内涵丰富，集古铜矿冶、聚落遗址和青铜器三位一体，是不可多得的青铜时代考古和青铜文化研究的个案。

枞庐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中部，是该成矿带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的鄂东南、九瑞、安庆—贵池、枞庐、铜陵、宁芜和宁镇七大型矿集区之一，铁、铜、金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山林茂密，柴薪充足，水网如织，交通便利，至迟到西周时期，枞庐地区便发展出一套包括铜矿开采、冶炼和青铜器铸造的完整青铜工业体系。

枞庐地区金属矿床的发育，来自中生代火山岩盆地的演化与形成。根据最新的地质调查显示，枞庐盆地内分布有数十个铜矿床（点），矿化类型以热液脉型为主。位于盆地中东部井边镇一带的井边铜矿床，包括井边矿段和石门庵矿段，是目前已探明的最大铜矿床，铜金属资源量为1万多吨，铜平均品位为1.31%。铜矿体由不同尺度的矿脉组成，长度一般为200米至500米，宽度通常为20厘米至50厘米，最宽可达4米。矿体埋藏浅，部分地段出露地表。矿石构造主要为脉状、网脉状和角砾状构造。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斑铜矿、镜铁矿和辉铜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和重晶石等。在地表氧化带中，可见孔雀石、铜蓝、蓝铜矿、胆矾等^①。位于枞庐盆地南缘的拔茅山铜矿床，矿化特征类似，但降低边界品位圈定的矿体则具有带状斑岩铜矿特征。在盆地周边和相邻的隆起地区如庐江沙溪等地，已发现多个大型的斑岩型和矽卡岩型铜矿床^②。

枞庐地区铜矿藏小矿点和矿化点较多，且距地表浅近，较为适合古代技术条件下的开采和

① 张乐骏、周涛发等：《安徽庐枞盆地井边铜矿床的成矿时代及其找矿指示意义》，载《岩石学报》，2010年第9期，第2729～2738页。

② 张寿稳：《安徽省枞阳县拔茅山铜矿地质特征》，载《资源调查与环境》，2007年第3期，第193～197页。



冶炼。该地区广泛分布的阔叶林的麻栎、苦栎树、青岗栎等硬质材，是冶炼的理想燃料。在枞阳、庐江、无为三县交界的山区，已发现古铜矿冶遗址数十处，散布范围数百平方公里，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采冶中心。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枞庐地区古铜矿冶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其中位于枞阳县将军乡井边村狮形山脚下的井边古矿井，构成形态有竖井、横巷和斜巷等，采矿深度7米至39米，斜巷长度20多米，斜巷底部的废弃碎石和碎木炭渣粒层中发现有绳纹陶罐、陶鬲和木铲等，年代在东周前后。斜巷石质较差地段，发现有支护木^①。2013年，经对枞阳县文物管理所藏采自井边古矿井支护木样本碳十四测年，其年代距今 2260 ± 30 。距井边5公里的庐江石门庵古矿井，采矿深度8米至30米，巷道呈鼠穴状弯曲，有木支护，巷内发现平衡石、铜凿、铁钎等采矿工具^②。此外，在枞阳的铜山、拔茅山（安凤中学）、牛头山、生鸡园、柿树、大凹岗、大包山，庐江的分金炉、金鸡岩、凤台山、炼铜凹、东顾山，无为的苏家凹等处发现采矿遗址，在拔茅山、生鸡园、铜山、分金炉、东顾山、苏家凹等地同时发现有冶炼遗存^③。

2012年4月至2013年7月，结合枞阳县第三次文物普查最新数据，安徽大学历史系与枞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枞阳县境内的15处古矿冶遗址进行了实地踏勘复查，记录了详细的遗址地理信息，采集了大量矿石、炼渣、陶片等标本，为研究古代炼铜技术、青铜器矿料来源、矿冶遗址年代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今后扩大调查范围、选取重点遗址发掘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

二

枞庐地区史前至商周遗址众多，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20世纪80年代，杨立新等最先调查了枞阳浮山、小柏墩及庐江孙墩等遗址，并对小柏墩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陶鬲与二里岗上层陶鬲近同^④。1989年和199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分别发掘了枞阳汤家墩和庐江大神墩遗址。

汤家墩遗址位于枞阳县周潭镇七井村，南距长江不远，地处长江冲积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地带，是一处典型的台形遗址，面积约6,700平方米^⑤。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器类有鬲、罐、豆、甗、钵、瓮等，另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瓷、印纹硬陶、石制工具和小型青铜工具，还发现有铜容器陶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枞阳县文物管理所：《枞阳县井边东周采铜矿井调查》，载《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第89～90页。

② 杨立新：《安徽沿江地区的古代铜矿》，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8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194～203页。

③ 汪景辉：《安徽古代铜矿考古调查综述》，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8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04～210页。

④ 杨立新、高一龙：《安徽枞阳、庐江古遗址调查》，载《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第7～10页。

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第4～14页。

范和铜矿石等。结合此前遗址内出土的一件青铜方彝,可确定该遗址是一处具有一定等级规模的聚落和冶铸遗址。简报将该遗址分为两期,1期以⑥至⑨层为代表,2期以③至⑤层为代表,两期在器形上基本一致,包括大型鼓肩鬲、弧腹鬲、折肩鬲、鼓(折)肩罐、折腹簋、粗柄折盘豆、细柄折盘豆、曲柄盃、敛口钵、瓮等器类,器形衔接自然。晚期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明显增多,可见盅、矮圈足豆等器形。经与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地层和典型器物相比较,汤家墩1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2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神墩遗址位于庐江县金牛镇徐河村,亦为一台形遗址^①。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灰陶为主,器表以绳纹最多,所见弧腹鬲、折肩鬲、鼓腹罐、曲柄盃等器形,特征与汤家墩遗存基本一致。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的演变趋势,亦可将该遗址分为两期,1期以 T331 ④、T332 ④为代表,2期以 T332 ③、T323 ③、T312 ③、T322 ③为代表,1、2期的年代基本可与汤家墩遗址相对应。

2013年6月,与枞庐一江之隔的铜陵师姑墩遗址发掘资料公布^②。师姑墩晚期遗存涵盖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际,代表性器形有绳纹鬲、刮面鬲、曲柄盃等,与江北地区枞阳汤家墩、庐江大神墩乃至江淮北部地区霍邱堰台、六安堰墩等遗址出土器形有很多联系。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包括铜矿石、炉壁、陶范、石范、炉渣和小件铜器等,亦可与汤家墩遗址相比较。师姑墩冶铸活动从早期一直持续到晚期IV段。早期冶铸活动规模小、产品少,晚期I、II段冶铸活动规模最盛,铜器、铜块合金类型多达6种,以铅锡合金和含砷多元合金为主,晚期III、IV段冶铸活动有所衰落,砷铜逐渐被锡青铜取代,冰铜冶炼技术成熟^③。

20世纪90年代,王迅最早将在江淮地区出土的一种周代陶鬲称为“淮式鬲”,主要特征有折肩、三足内聚、裆较高、足尖较细、多饰绳纹,定为西周时期出现的典型淮夷陶器^④。2002年,学界基本认可江淮地区西周时期出现的折肩鬲是探寻淮夷文化的重要线索^⑤。折肩鬲早见于肥东吴大墩和含山大城墩遗址西周地层,后在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六安堰墩等遗址西周中晚期地层亦有出土。汤家墩遗址出土折肩鬲如标本 T3 ⑥:2、T6 ⑨:9,大神墩遗址出土折肩鬲如标本 T322 ④:5。霍邱堰台遗址出土折肩鬲约20件,锥状足鬲的年代在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柱状足鬲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⑥。师姑墩遗址出土绳纹折肩鬲如标本 T4 ⑧:21,瘪裆较高,截锥状足,腹部饰弦断绳纹,足部饰纵向绳纹。出土素面折肩鬲如标本 T37 ⑦:1,器身为泥质黑皮红胎,足跟部为略夹细砂红褐陶,联裆,裆部较高,截锥状足。师姑墩遗址还出土一种带把鬲,如标本 T6 ⑤:91,在六安堰墩遗址也有出土。江淮地区还出土折肩铜鬲,如舒城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庐江大神墩遗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第8~11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13年第6期,第3~23页。

③ 王开、陈建立、朔知:《安徽省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的相关问题》,载《考古》,2013年第7期,第91~104页。

④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载《考古》,2002年第2期,第3~14页。

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2~268页。

凤凰嘴墓葬出土3件，侈口，束颈，折肩，高弧裆，尖锥状足^①。潜山黄岭墓出土4件，侈口，束颈，折肩，斜腹，三空心尖锥状足，肩下饰一对称扉棱^②。张钟云认为：“除舒城的尖足鬲外，其余地方皆为平柱足。从时间上看，本地的鬲要早于随县和信阳地区的，而山东地区的折肩不明显。因此，这种鬲很可能发源于江淮区域，而尖足是其母型。”^③折肩陶鬲与折肩铜鬲形态既相一致，时空范畴又相重叠，应为同一文化或族群之遗存。

江淮地区出土曲柄陶盃，早期在合肥肥西老虎头、金寨双河等处^④有零星发现。2002年以后，又在霍邱堰台、六安堰墩、庙台^⑤、霍山戴家院^⑥、庐江大神墩、枞阳汤家墩等处发现。堰台曲柄盃，质地以夹砂灰陶或灰黑陶为主，少量为泥质灰陶，钵鬲之间有算，两周或三排圆形或椭圆形算眼，器表多饰绳纹。器形除一件为平口鬲形外，均为钵口甗形。盃柄截面圆形或椭圆形，素面，尾端形态呈上翘或卷涡状。堰台曲柄盃在西周早中期即已出现，西周中晚期最为盛行，少量延续到春秋早中期^⑦。枞庐地区，大神墩遗址公布了2件甗形盃标本，一件是标本T323③:1，夹砂黄褐陶，上部钵形，算有8个镂孔，下部鬲腹较直，浅袋足，高弧裆，实足跟较高，角状鋤手，顶端为兽头状，腰际有一周半月形的指压纹，下部通饰绳纹。另一件是标本T322③:1，夹砂灰陶，粗短流，角状鋤手顶端残，鼓腹，深袋足，高弧裆，腰部以上残，素面。汤家墩遗址也发表了2件甗形盃标本，一件是标本T6⑦:6，夹砂灰陶，上部钵口，算有12个稻粒状孔眼。另一件是标本采:6，夹砂黑皮陶，折肩，锥状足内收，足端平，腹部有流孔和扁把手，肩上饰弦纹，下部饰绳纹。皖南地区曲柄盃早见于南陵千峰山土墩墓^⑧，但以铜陵师姑墩遗址出土最为丰富。师姑墩盃多为泥质红褐陶，略夹砂，上部多已残，下部鬲形，钵鬲之间有算，算孔一字形，盃柄尾端上翘，多脱落。流可分为管状流和槽形流，其中槽形流的完整形态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为其他地区所不见。管状流盃如标本F2:1，鼓腹，锥状足，联裆，下腹部饰粗绳纹；标本T7⑩:1，微瘪裆。槽形流盃流口上方两侧分别贴泥片，鼓腹，柱状足，标本T8⑧:1和T11⑩:2，均联裆，腹部饰粗绳纹。

①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载《考古》，1964年第10期，第498～505页。

② 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13辑，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125～127页。

③ 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0～179页。

④ 杨德彪、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71页；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62～190页。

⑤ 张钟云：《安徽六安发现西周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8日，第001版。

⑥ 朔知、怀才高：《安徽霍山戴家院遗址发掘获得重要成果》，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12日，第001版。

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288页。

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载《考古》，1989年第3期，第219～232页。

三

枞庐地区出土青铜器，连方彝在内的青铜容器已有数十件，包括吴王光剑在内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数量更为可观。枞庐青铜器多为墓葬或窖藏出土，出土单元或共存关系明确。枞庐青铜器既有方彝、觚形尊、垂腹鼎、球腹鼎等中原周式器形，也有牺首鼎、曲柄盃、双耳缶等江淮本土器形，还有大铙、句铙等南方吴越器形，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2012年4月至2013年10月，安徽大学历史系与枞阳县文物管理所合作，对枞阳县历年出土青铜器进行了初步整理，主要包括汤家墩遗址出土青铜方彝，官塘西周墓出土兽面纹尊、重环纹鼎，前程西周墓出土弦纹爵、窃曲纹鼎、觚形尊，杨市春秋墓出土变形蝉纹鼎、龙螭四足匜，会圣春秋墓出土雷纹鼎等。

汤家墩遗址出土方彝1件，有盖，平沿，腹壁斜收，上宽下窄，圈足，圈足内置一悬铃。四角各有一条扉棱，呈断续云纹状。盖如四阿式屋顶，顶有立柱钮，柱钮上饰有三角雷纹。盖面分为上下两层纹饰，上层鸟纹，下层鸟纹后置蝉纹。器腹上半部饰直线纹，中置兽首螭，下半部饰浮雕牛角兽面纹。圈足上饰有夔纹。彝足内置悬铃，中原地区少见，宝鸡纸坊头M1所出均为簋类器。盖上及器腹所饰小鸟纹和牛角兽面纹，均为殷末周初所流行。李学勤先生根据其器形和纹饰要素及其与宝鸡青铜器的对比，推断其年代不晚于周初，且为本地铸作^①。杜迺松先生亦认为此彝风格独特，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少见^②。

前程西周墓出土青铜器4件，其中弦纹铜爵1件，流口残，尖尾上翘，帽形高柱，兽首吐舌螭，卵底，刀形三足，腹部饰三周凸弦纹。窃曲纹鼎1件，立耳，垂腹，三柱足。口下饰一周有目窃曲纹，间以蝶形纹，上下有弦纹作栏界，其下又有一周凸弦纹。足根部饰扉棱兽面纹。圆腹素面鼎1件，立耳，腹较深，腹壁近直，下腹微鼓，柱足，足根部略粗，通体素面。觚形尊1件，仅存中腹部。前程组的年代，可拟定在西周中期。

官塘西周墓出土青铜器3件，其中兽面纹觚形尊1件，侈口呈喇叭状，长颈、鼓腹、圈足，腹部饰兽面纹及鸟纹，颈下、圈足上部各饰两道凸弦纹。兽面纹左右两部分略有不对称，应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瑕疵。根据屯溪土墩墓M1所出父乙尊^③，以及邻近的潜山彰法山出土兽面纹尊^④，推断官塘尊的器形应在西周早中期。重环纹球腹蹄足鼎2件，形制基本相同，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纹作四重，最小一环内饰三个小圆点，有上下弦纹作界栏，其下再有一周凸弦纹。立耳外侧饰两周小圆点纹，间以弦纹。器型和纹饰，都出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间。

① 李学勤：《安徽南部存在着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载《学术界》，1991年第1期，第37～40页。

② 杜迺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见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会编：《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57～61页。

③ 李国梁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

④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9。

杨市春秋墓出土青铜器 3 件，其中变形蝉纹鼎 2 件，形制基本相同，立耳外撇，圆鼓腹，三蹄足。腹上部饰一周密点纹，上下各有一周弦纹作界栏；下部饰一周变形蝉纹，内填二乳钉、小圆点纹等。上下纹饰带又各饰以六条短扉棱。鼎耳外侧饰小圆点纹，间以弦纹。变形蝉纹鼎在江淮地区还可见数例，如怀宁金拱、庐江盩头和六安思古潭所出^①，年代基本相一致。龙螭四足匜 1 件，瓢形腹，四蹄足，口下饰一周窃曲纹，其下又有五道凸弦纹，龙螭衔沿，作俯身探水状，龙尾上卷，柱角，龙身饰鳞纹。在江淮及皖南沿长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发展中，青铜匜有龙形螭和燕尾螭两种形态，并有着可见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能代表了某种文化变迁。杨市组的年代，可以拟定在春秋早期。

会圣春秋墓出土雷纹鼎 1 件，立耳，球腹，蹄足。口下一周 S 形雷纹，上下以弦纹作界栏，其下又有一周凸弦纹。会圣雷纹鼎的年代，可以拟定在春秋早期。

此外，在枞阳旗山沙河墓地 M18 出土句鑃 1 件^②，合瓦型，扁方条柄，根部有宽带，平舞，平腹，侈铉，曲于，微凹口。钲部饰云雷纹和三角纹，柄根部宽带两侧各有一长条形凸起和五个乳丁。腔体内壁光平，内壁一侧有舌状凸起。句鑃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和安徽南部地区，属于吴越文化分布的范围，应是吴越两国特有的乐器。

无为县开城镇大童村和襄安镇文思村分别出土一组青铜器。大童村出土青铜器 4 件^③，其中窃曲纹球腹蹄足鼎 1 件，立耳，口下饰一周无目窃曲纹，其下又有一周凸弦纹，耳部外侧饰两条凹弦纹，器形和纹饰，都在西周晚期。素面垂腹蹄足鼎 1 件，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窃曲纹分体甗 1 件，上部甗形，立耳外侧饰两条凹弦纹，顶端置小伏兽。口下饰一周窃曲纹，上下各有一周弦纹作界栏。下部鬲形，子口，肩部着一对瓣形环耳。从器形和纹饰判断，应为西周晚春秋早期器。鸟钮壶形盃 1 件，三支钉形足，流口开于口沿，器身与器盖又分别置一对对合环形耳，此器器形独特，为江淮地区所仅见。大童组的年代，可以拟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文思村出土青铜器 2 件^④，其中夔纹垂腹蹄足鼎 1 件，宽折沿，方形立耳微外撇。腹饰一周夔纹，上下各有一周凸弦纹。立耳外侧饰两周小圆点纹，间以弦纹。窃曲纹鼎 1 件，斜直立耳较高，三蹄足。腹部饰一周有目窃曲纹，上下各有一道弦纹作界栏。立耳内外侧均饰云纹。文思组的年代，亦可拟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庐江县除在泥河出土一件青铜大铙、汤池出土一把吴王光剑外，还在岳庙、盩头和三塘各出土一组青铜器。

泥河出土青铜大铙，通高 49.5 厘米，横截面为合瓦形，甬中空，通于铙体内腔，有旋，口

①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出土春秋青铜器》，载《文物》，1983 年第 11 期，第 58～71 页；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年，图 18；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两件春秋铜鼎》，载《文物》，1990 年第 1 期，第 53 页。

② 郑玲、叶润清：《试析安徽枞阳旗山战国墓出土铜句鑃》，载《文物》，2010 年第 12 期，第 61～65 页。

③ 安徽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 年，图 074～077。

④ 安徽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 年，图 078～079。

部稍内收呈弧形。主体纹饰两面相同，均以细密卷云纹为地浮雕兽面纹，在粗壮的兽面纹上用细线勾勒卷云纹，鼓部突起，饰变形兽面纹，其余部位饰卷云纹^①。皖南、苏浙以及长江中游的湘赣都曾出土过这种青铜大饶，形体高大无法手执，纹饰繁缛，以云纹和乳钉纹最为普遍，云纹之上凸起双目成兽面纹。安徽境内目前已出土4件，另外3件分别在皖南的马鞍山、青阳和江北的潜山出土。一般认为青铜大饶为南方系统，流行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庐江汤池出土吴王光剑，剑身较宽，前镞束收成锋，突脊呈直线，斜从，凹形格，扁圆茎，茎上有两道箍节，剑首缺失。剑格铸有花纹，原镶嵌绿松石，现已脱落。茎部残留有缠缚痕迹。剑身近格处铸有两列、共计16字的铭文^②。

庐江岳庙出土青铜器3件，分别为牺首鼎、曲柄盃和匚形斗各1件^③。盩头出土青铜器2件，变形蟬纹鼎、曲柄盃各1件^④。三塘出土青铜器4件，分别为牺首鼎、夔纹匚、盥和环耳罐形缶各1件^⑤。

牺首鼎由舒城凤凰嘴始出，迄今已有8件，其中江淮地区7件，皖南沿长江地区1件。牺首鼎的形态，圆垂腹一侧作兽首状，无流，另一侧一般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蹄形三足，兽首一般有双角和凸起的双目。依据前足上部有无凸起的蟠龙饰，又可大致分为两类，前足上部有凸起的蟠龙饰，如三塘鼎，竖立的犄角呈扁平状，和鹿角相仿，凸起的圆眼中间有一凹圆，凹圆中有镶绿松石圆珠，前吻部两侧轻微隆起圆包，其上密布小点，尾部扉棱，整体表现或为顾首的夔龙。前足上部无蟠龙饰，如岳庙鼎。在关中、晋南地区牺尊和匚形鼎器形的影响下，经与淮河上游地区牺尊、沂沭河流域匚形鼎器形的交流，人们对本地牺尊、龙盩匚和附耳鼎的传统进行了创新改造，由此产生了牺首鼎的形态。牺首鼎分布的区域，可界定在淮河以南、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和皖南沿长江地区。牺首鼎流行的年代，应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曲柄陶盃已如前述。曲柄铜盃多作钵口或盘（盆）口甗形，少量为平口鬲形。江淮地区迄今已出土曲柄铜盃13件，地点集中在六安、舒城、肥西、庐江、怀宁和潜山一带，除1件平口鬲形盃外，其余均为甗形盃。依盃柄的形态，又可区分为单体龙（凤）柄和两段式卷曲柄二型，单体龙（凤）柄型如盩头盃，两段式卷曲柄型如岳庙盃。皖南沿长江地区也陆续有曲柄铜盃出土，地点集中在铜陵、繁昌、南陵和芜湖这一相互连接的区域，年代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⑥。

匚形斗，柄部与斗首连接处弯曲成乙字形，后半段为条形直柄，且逐渐增宽，斗首为匚形，

①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10。

② 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载《文物》，1986年第2期，第64页。

③ 马道阔：《安徽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Z1期，第74～78页。

④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10、17、19。

⑤ 安徽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年，图043～046。

⑥ 张爱冰：《也谈曲柄盃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文物》，2014年第3期，第57～64页。

圜底，敛口有流，斗柄饰变形夔纹^①。六安燕山村出土一件匚形斗，形制与庐江县岳庙所出近似，柄饰窃曲纹^②。这种条形柄的匚形斗，为其他地区所不见^③。

环耳罐形缶，三塘之外，舒城河口、怀宁金拱和寿县肖严湖也有出土，形态基本一致，子口，圆鼓腹，平底或平底微内凹，平盖，盖置半环钮，肩部有左右对置环形耳，全器素面无纹饰。牺首鼎、曲柄盃、匚形斗和罐形缶，器形特征鲜明，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应为江淮群舒文化之遗物。

综上所述，枞庐北接江淮和中原，南与铜陵、池州隔江而望，是中原、江淮与长江以南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枞庐沿江地区所出铜器，大体属于中原周式的系统，而枞庐北部地区所出，则多具江淮群舒的风格，这就为探明西周春秋时期江淮青铜文化的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基于丰富的铜矿资源和发达的青铜工业，枞庐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灿烂的物质文化遗产。枞庐地区青铜文化遗产的内涵与规模，完全可以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盘龙城、铜绿山、吴城、大洋洲以及皖南、宁镇地区相媲美。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研究的不断深入，枞庐地区青铜文化的学术地位也日渐凸显。枞庐青铜文化研究的领域，应包括建立区域青铜文化的年代序列和空间分布形态，建立区域青铜文化遗产的科学认知，探明区域青铜工业的规模与技术水平，揭示区域铜矿资源、青铜工业和青铜文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概括区域青铜文化发展的演进路线和动力。

① 马道阔：《安徽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载《东南文化》，1990年Z1期，第74～78页。

② 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载《考古》，1993年第7期，第656～659页。

③ 王庆光：《试论匚形斗的命名、年代与功能》，载《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第165～170页。

序	1
Preface	
凡例	1
Guide to Use	
前言 · 长江下游枞庐地区青铜文化初论	1
Introduc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ronze Culture of Zongyang -Lujiang Area in Lower Yangtze River	
 枞阳商周青铜器图录	1
Catalogue	
○一方彝 (ZW00889) 西周	3
Rectangular Yi (wine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二兽面纹尊 (ZW00952) 西周	14
Zun with beast face design (wine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三重环纹鼎 (ZW00950) 西周	17
Ding with double ring design (food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四重环纹鼎 (ZW00951) 西周	21
Ding with double ring design (food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五弦纹爵 (ZW00981) 西周	25
Jue with bow string design (wine vessel)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六窃曲纹鼎 (ZW00982) 西周	29
Ding with qiequ design (food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七素面鼎 (ZW00983) 西周	34
Unadorned Ding (food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八觚形尊 (ZW00984) 西周	36
Gu-shaped Zun (wine container)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 771 BC)	
○九变形蝉纹鼎 (ZW00954) 春秋	37
Ding with stylized cicada design (food container)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BC - 476 BC)	
一〇变形蝉纹鼎 (ZW00955) 春秋	41
Ding with stylized cicada design (food container)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BC - 476 BC)	